

一个永不消逝的紫色背影

——痛悼亲如兄弟的搭档徐葆耕

○孙殷望（1961电机）

葆耕走了！走得如此匆忙而突兀，从发病到去世仅有两个来月，以至连正式的治疗方案都来不及确定。葆耕走了！走得如此令人痛惜而伤悲，清华园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儿子和一个可以引为骄傲的才子；而我失去了一位在中文系朝夕相处十年的工作搭档和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学兄。葆耕走了！走得如此从容而镇定，在人生的最后几天，不仅为亲属写下了遗嘱，安排了后事；而且写下了两篇感人至深的遗文（《徐葆耕教授生平纪略》和《告别书》），在坦陈概述自己一生的同时，也不忘向22位亲密的挚友和同事作最后的告别。葆耕走了！走得又如此遗憾而不甘，他新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半个月亮半个太阳》和献给母校百岁大寿的学术专著《清华精神生态史》正待出版而未能亲见，连自己即将到来的毕业50周年纪念活动也未能等来。最后不得不在遗文中发出这样的自我感叹：“徐葆耕教授还有一系列创作计划；病魔出其不意地攫住了他，将他的才华和对这个世界的爱一起带走了。”呜呼！斯人如此离去，痛哉！痛哉！！

我和葆耕同庚，生于抗日烽火燃起的1937年，他的生日是端午节，我的生日是中秋节，他比我年长96天，再加上他又比我高一个年级，故我一直视他为兄长。而且，我们的工作经历也极为相似，均奉命“弃工从文”，毕业后改行做政治理论

课教师，后又同在校机关工作。但由于就读于不同系别，又就职于不同教研组和机关不同部门，因此虽彼此相识却又无缘深交。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清华园内文采飞扬的写作高手，而我虽也被人称作“笔杆子”，但就写作能力和水平而言，我甘拜下风，自叹弗如。1985年，学校决定复建中文系，他是建系的几个元老之一，并一直担任系行政的主要负责人。在复系之初的几年，他和我的另一好友张正权（任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搭档，从创办编辑学双学位班和建立计算语言学学科入手，探索培养复合型人才（工学士加文学士）和“文理结合”的办系新路。同时，又积极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并从中创收，为系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提高教职工的收入开辟财源。短短几年，这个全校最小的系呈现一派生机，令人刮目相看。

199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张正权在前往上课时突发心脏病倒在了教室的走廊里，随后我被学校派往中文系接替他的职务，并从此开始了与葆耕长达十年合作共事的历程。1993年底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后，我俩同时担任院党政领导职务，并仍兼原有系职。在此期间，葆耕作为中文系主任和主管科研的副院长，为我校文科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贡献良多。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从理工科横跨进文科的闯入者，我总觉得自己有责任继承和

□ 怀念师友

发展老清华“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会通”的传统，特别是在“文理结合”方面做一些新的试验，因为我坚信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为了这份责任，他一方面挥笔撰文，写下了《半个世纪前的〈刍议〉》、《走出“半人时代”》、《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文理会通辨析》、《科技与人文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人》、《文理会通是智者的精神内需》等一系列短论，阐述和宣传自己的理念，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不少文教界人士的认同；另一方面则通过在中文系本科教育中增加科技类课程、首设计算语言学方向等试验，来践行并检验这一理念。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中文系的教学和科研显示出了与传统中文学科教育略有不同的特色，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包括双学位、本科生和研究生）绝大多数表现优异，成绩斐然，成为青年才俊和社会精英。后来，他又进一步把中文系引入“入主流，争一流”的发展轨道，特别致力于网罗优秀人才，将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召至麾下，大大提高了师资队伍的综合实力整体水平，为中文系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观他的一生，除了本人在教学、科研和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之外，他作为任职十余年的系主任，为中文系从复建、崛起到迈向初步兴盛立下了头功，其成就也同样令人瞩目，连同他在人文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和全校文化素质教育中心担任领导工作的出色成绩，正如曾任校长助理和人文学院党委书记的李树勤同志对我所说，葆耕为清华大



学文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我作为他的搭档，在工作中相互支持，默契配合，彼此真诚相待且一起善待别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系内外有些同志称我们两人是“黄金搭档”、“最佳搭档”，虽有些溢美但毕竟也是一种肯定，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而欣慰。2007年夏秋之交，中文系几个年轻教师特意选在端午节和中秋节之间为我俩过七十岁生日，并为我们照下一张头戴“寿星帽”的合影（上图，右为徐葆耕），场面温馨如家庭聚会。葆耕在《告别书》中说：“非常感谢兼斌和小宁、自学一起为我和殷望举办了七十岁生日的宴会。我会把这一美好的记忆带到另一个世界。”同样，我也会把“这一美好的记忆”永远留在心中，并把这张合影永远珍藏。

葆耕于新世纪之初出版了一本名为《紫色清华》的书，收录了他陆续发表过的与清华有关的学术随笔和个人回忆的文章35篇。他在本书的《后记》中说：“敢于结集面世，实指望读者能从一个在清华呆了45年的普通教师的视角透视这所大学的精神躯体，或许还会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所谓“文如其人”，我

们也可以从这本书中触感到作者本人的心灵历程以及他的精神世界与心结情操。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紫色的情有独钟和对朱自清先生的格外崇敬。他在本书的《自序》中写道：“色彩学谓曰：紫色由红、蓝两色混合而成。红色是火焰，蓝色是海水；红色是欲望，蓝色是理智；红色是我们的国色，蓝色是西土的象征；红蓝相融就是中西文化的会通，亦是清华的历史与文化的特征。”他还自喻为“一个戴着‘紫色眼镜’的人”。实际上，葆耕既有对工作对创作如火焰般的热情以及对追求理想目标的强烈欲望；又不计较个人得失，善待同事和朋友甚至反对自己的人，对人重情且对事重理，具有宽广而理智的胸怀。从这个意义上说，葆耕身上确有“紫色”的特征。

在清华中文系的历史上，有两个任职时间超过10年的系主任，一个是朱自清先生，一个就是葆耕。而葆耕一直把朱先生

当作自己为人为学的楷模。他盛赞朱先生是“20世纪的圣者”，用自己的崇高的文化人格哺育了中文系的代代学子。他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位伟大的父亲，作为后继者，我们没有理由背叛先生的精神与事业。1998年11月14日，在纪念朱自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葆耕在发言中最后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随着时间的流逝，朱先生的背影正越走越远。这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我们这些祭奠者：我们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背影？我们的背影是否如先生那样引导后人向着更高的境界攀登？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现在，葆耕走了，他也留给我们一个背影，一个永不消逝的紫色背影。于是，我以此为标题，写下了这篇悼文，寄托我对他的无限哀思和永久的怀念。但愿葆耕能在天堂与朱先生相聚，共同总结探讨清华中文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继续给后人以激励和启示……

（上接第142页）探讨学术问题。其中一封是考证“羸”字的。1979年5月12日信：“关于大作中‘羸’字的解释，我以为不一定如旧释作‘浅毛的猛兽’解，仲长敖《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可见倮类包括人和猛兽。此次随县发现的编钟的简虚，即作人形。未悉尊意以为如何？”并且认为苟萃华的《“羸”非兽类辨》（科学史集刊第5期）中的“羸虫专指人类而不包括兽类”，则“又陷入另一偏差，不可取”。前辈学人坦率、认真、扎实、纯粹的学术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从1974年到1985年的11年内，夏鼐先后荣获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等称号和职位，成为中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夏鼐每次接受荣誉时，总是谦虚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界的荣誉。”

（转自《山东画报》网站，2008年7月8日，作者鲁仁、刘陶）